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二辑) 黄俊杰主编

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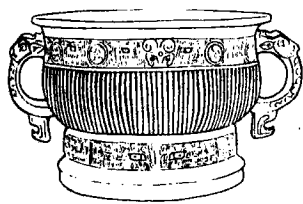
蔡振丰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二辑)

黄俊杰主编

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 / 蔡振丰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8463-1

I. ①东… II. ①蔡…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东亚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037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 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0-700 号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

编 者 蔡振丰
组稿编辑 龚海燕
责任编辑 宋坚之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4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463-1/B·614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十余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审查通过后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一百五十余种,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东亚儒学研究丛书”、“东亚儒学研究资料丛书”、“全球在地视野丛书”等六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儒学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

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发展。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儒学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十余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东亚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简体字版的出版与发行,在 2008 年推出丛书第一辑 32 册之后,又积极筹备出版第二辑 10 册。相信这项出版工作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东亚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11 年 11 月 28 日

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序 言

黄俊杰

《东亚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这部书,是2007年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推动“东亚朱子学”研究的部分成果,由蔡振丰教授费心编辑成书。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乐于略志数语,说明我们有关“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朱子(晦庵,1130—1200)是东亚思想史中继孔子(前551—前479)之后的关键人物,朱子学对最近八百多年来东亚思想界的影响至深且巨,所以,20世纪的中外学术界有关朱子学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如夏夜繁星,指不胜数,诸多论述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尤其以钱穆(宾四,1895—1990)先生的《朱子新学案》^①与牟宗三(1909—1995)先生的《心体与性体》^②,允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巨著。

站在前辈学者丰硕的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从三个方向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研究:

第一,以东亚为视野,研究朱子学在中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各地之发展的同调与异趣。20世纪汉语学术界的朱子学研究论著,在中国朱子学研究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朱子学在东亚周边地区之发展的相关研究,则刚刚起步,尚待努力。2000年是朱子逝世八百周年,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

① 钱穆:《朱子新学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1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

中心举办“朱子学与东亚文明研讨会”，会后出版《朱子学的展开》共两卷，^①第2卷即为《东亚篇》，由杨儒宾先生主编。2006年12月，我与林维杰先生合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一书，^②对朱子学在东亚各国的发展续有探讨。现在蔡振丰先生所编的这部书，就是在这条研究线索上继续发展。

第二，我们可以将研究焦点更集中在东亚朱子学的发展过程。现在关于朱子学的研究论著，基本上集中在朱子学的成熟系统的研究，所注重的是作为完成态的朱子学，而不是朱子学的发展过程。

所谓“作为发展过程的朱子学”的研究兼摄三义：

（一）指朱子本人思想发展之历程之研究。例如研究朱子的《论语》学，可以追溯从《国朝诸老先生论语精义》到《论语或问》到《论语集注》之发展历程中，朱子思想的变化。

（二）指朱子门人及后学对朱子学的推衍与创新。关于朱子门人师事朱子之先后，日本学人田中谦二已有《朱子弟子师事年考》长文，^③细密扎实，极便参考。朱子门人及其后学，对于朱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所建构的思想系统，常提更细部的解释，可以窥见朱子学在朱子之后的发展过程。举例言之，朱门高弟、朱子女婿黄干（直卿，1152—1221）对朱子学说常能加以推衍，提出综合的解释。《论语·学而》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子在《集注》与《或问》中解释不同，黄干说：“《集注》言学，而《或问》以知与能并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学于人有此二者。先觉之人于天下之理，该洽贯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于是日听其议论，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觉之人于天下之事躬行实践，而吾怅然未有所能也。于是日观其作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读书穷理，要当尽圣贤之意，备事物之情，非吾好为是详复也，理当然也。世之学者，意念苟且，思虑轻浅，得其一隅，便

①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朱子学的展开》，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版。

② 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③ 田中谦二：《朱子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1973年第44期，页147—218；1975年第48期，页261—357。

以为足，则其为疎率也亦甚矣。学者观于此，亦足以得养心穷理之要矣。”^①黄干的解释确实可以厘清朱子的说法。诸如此类朱子门人及后学对朱子思想的推衍言论，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借鉴。

（三）朱子学的发展过程还可以从不同区域来看。在朱子门人与后学之中，福建的蔡沈（仲默，1167—1230）、蔡模（仲觉，1188—1246）父子，及陈淳（北溪，1159—1217）、黄士毅（子洪，生卒年不详）等人对朱子学的继承，已有高令印先生的《福建朱子学》^②一书深入研究。徽州的陈栎（寿翁，1252—1334）撰《四书发明》，江西的饶鲁（伯舆，生卒年不详）撰《语孟纪闻》等书，金华的金履祥、许谦等人，均对朱子学进行各具地域性特色的阐释与发展。此外，朱子学在域外的发展过程中，与朝鲜及日本当地的特殊思想风土相激盪而有所调整，经历16世纪朝鲜朱子学大师李滉（退溪，1502—1571）所谓的“损约”而展现地域性之思想特色。^③

第三，朱子学的研究也可以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相呼应，而开发朱子学对21世纪的新意义。朱子学中的重要命题如“理一分殊”，对21世纪的“政治身份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对“自我”与“他者”的互动问题，都具有崭新的启示，值得深入探讨。“周虽归邦，其命维新”，朱子学实在是21世纪东亚文明的重要精神资产。

总而言之，蔡振丰先生所编辑的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对于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朱子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希望我们的东亚朱子学研究走得更远、更正确！

① 胡广：《论语集注大全》，收入严灵峰编辑：《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第12函，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卷1，页2。

② 高令印：《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见李滉：《朱子书节要序》，《退溪学丛书》之《陶山全书》3，首尔：退溪学研究院1988年版，卷59，页259。

目 录

序言	黄俊杰	1
导言	蔡振丰	1
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	黄俊杰	8
从“存在空间”论朱子的身心空间观		
及人安居于天地之论述	潘朝阳	19
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	李明辉	62
朱子与罗整庵的“人心道心”说	林月惠	88
从良知学之发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态	杨祖汉	121
朱子对佛教的理解及其限制	蔡振丰	137
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		
——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	金永植	164
朱子穷理学在德川末期的物理化	张崑将	185
外文人名索引		212
中文人名索引		213

导 言

蔡振丰

2007年4月6日至8日,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人文学院与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区域研究中心、世界朱氏联合会于厦门大学共同举办了“朱子学与闽台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朱子与闽台文化学术研讨会”。这场研讨会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部分的论文涉及中、日、韩三国朱子学的诠释与发展,因而合为一集,可谓是2006年12月黄俊杰、林维杰所主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的接续之作。

本书共收论文八篇。第一篇为黄俊杰先生的大作《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所以将之列为本书的开首,是基于论文所展现的两个意义:(1)从东亚儒学的发展而言,朱子学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学问,而东亚各国对朱子学曲折的诠释,实也是其“理一分殊”说的具体而微。(2)不同时代的学者皆可于对朱子学的创造性诠释中,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论说,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朱子学对当代的种种议题也仍具有启发之义。黄俊杰在论文中指出:“为了因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的‘理一分殊’可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这种问题意识充分地指出了传统朱子学的价值及其现代诠释的新意趣。

《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一文,着眼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相互连结性(interconnectedness)”的概念。黄俊杰认为全球化所造成“相互连结性”的强化,一方面虽然使全球人才、物资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便利,一方面却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传

统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针对全球化在政治、文化、经济冲突下所造成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黄俊杰指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成为抽离于国际间具体互动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机制，而不是各国互动脉络下，与时俱进、随时修正的潮流”。作者对全球化得失的批判，脱胎于朱子的“理一分殊”说，认为朱子对“理一”与“分殊”两者关系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全球化危机的问题所在。作者认为：就“天理之一”与“分殊之多”而言，朱子强调“理一者，贯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如将这概念放在全球化的脉络中思考，则作为抽象性的“全球化”之“理一”，应该与“国际间文化、政治、经济互动下”所形成的“分殊”，有着本体论上“相即不离”的关系，如此才能免于“本来是‘多’（分殊）中的‘一’（理），转化成为‘多’（分殊）之上的‘一’（理）”，使“理一”成为宰制“分殊”的借口。黄俊杰的论文不但赋予古代哲学新的生命，也为传统的研究指出新的路向，可视为朱子学之现代意义的理论演出。

本书的第二篇论文《从“存有空间”论朱子的身心空间观及人安居于天地之论述》是潘朝阳先生的大作。论文中的“存有空间”(existential space)一词，是由人文地理学者爱德华·瑞夫(Edward Relph)所说的“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转化而成。“地理空间”的概念建立于现象学对“环境”(environment)与“世界”(world)的区分上；认为人对“环境”有“意向性之连结”(intentional links)，通过人的“意向”对“环境”命名及人文化(humanized)的过程而产生了“地理空间”。论文所指的“存在空间”是在“地理空间”基础上，加以强调“身心主体”(body-mind subject)的概念；作者藉由对“地理空间”之主观面及价值面的说明，形成了“安居”的论述。

依循着“存在空间”的概念，潘朝阳认为《中庸》本文中即涵藏有“存在空间”(空间存有学与道德存有学相摄)的意义，而朱子注解《中庸》时所建立的“道统”及“人心、道心”论，也可视为是身心如何安居于宇宙或天地空间的论述。论文透过“君子”、“鬼神”、“古圣王的人文历史传统”来说明《中庸》所含蕴的儒家型存在空间与朱子对此存在空间的诠释，其论说的角度颇有创发，值得学界参考。

本书的第三篇论文为李明辉先生的大作《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与第四章林月惠先生的鸿文《朱子与罗整庵的“人心道心”说》，皆论及“人心、道心”这组宋明理学的关键词语。其中，《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的主要用意在于厘清“人心、道心”在朱子“心、性、情”三分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于论述之中也触及了韩国朝鲜儒者对“人心、道心”说的争论；而《朱子与罗整庵的“人心道心”说》则更细致地论说罗整庵与朱子说法之异。两位先生皆出于牟宗三先生之门，立场虽有延续师说之倾向，但其推述过程严密，对于牟先生之意见实有精密、拓展之功。

李明辉论文主要涉及了三个争议性的观点：一是“人心”、“道心”之说在朱子的理论中是属“理气论的诠释”或“心性论的诠释”。“理气论诠释”与“心性论诠释”的不同在于：前者以道心属理，人心属气；而后者以“道心、人心”为“一心”之表现，皆属于“气”之一面。作者认为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解释应是心性论的诠释；同时，他也指出这个问题不但在宋、明儒间有不同的说法，在朝鲜儒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第二个观点论及“心”在朱子义理系统的定位，为上一个问题的延伸。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以现今学者陈来的观点作为潜在的论敌。简而言之，陈来认为“心”为“气之精爽”，不属形上之“理”，也不属形下之“气”；而李明辉认为朱子理论系统下之“心”明显为“气”，故而对陈来的说法有所辩证及反驳。论文的第三个观点在于“人心、道心”与“人欲”的关系上。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着眼于部分学者以“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不但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也依此认为朱子理论中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对此问题，李明辉认为朱子并不否定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因而其理论只能是康德所言“严格主义”的立场，而不会是“禁欲主义”的立场。上述三个有关于“人心、道心”的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且作者的论证谨严合理，颇有不易之势。然而，其中的第二个论点似乎也未尝没有讨论的空间，所以这篇论文如能引起更细致的论辩，实对学界有很大的贡献。

林月惠《朱子与罗整庵的“人心道心”说》的论题近于李明辉文，以“人心、道心”在朱子“心、性、情”中的定位为其问题的起点，两篇论文实可以相

互补充。林月惠认为朱子的《中庸章句序》中对“人心道心”的区分是由“心之虚灵知觉”切入。由这个角度,他认为可以先厘清朱子说法中三个关键论点。一是“人心、道心”的区分取决于“已发”之心所知觉对象的不同;知觉于自然欲望者是人心,知觉于道理者是道心。二是:“心”是“人心、道心”的交界处,此即所谓“(人心、道心)二者杂于方寸间”。三是“惟精惟一”的工夫在使辨明“人心、道心”的交界处,使之不杂,而能使道心作主,故朱子常强调“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对照罗整庵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法,则可看出其与朱子说的三个差异之处。一是罗整庵以“道心”为“未发”之“理”或“性”,以“人心”为“已发”之“气”或“情”,这与朱子视“人心道心”为已发的论点不同;其二是罗整庵认为“人心、道心”为异质异层,无相杂之问题;由此延伸至第三个“惟精惟一”的工夫问题,即罗整庵认为对“道心”要做“惟一”的工夫,对“人心”则要做“惟精”的工夫。

除了朱子与罗整庵在“人心道心”说上的不同观点外,《朱子与罗整庵的“人心道心”说》还论及罗整庵“人心道心”说(心性论)与其论“理气为一物”(理气论)是否具理论一致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可见于刘戡山、黄梨洲及朝鲜儒者的讨论之中。林月惠认为从形式上看,朱子与罗整庵的心性论及理气论两者虽有不同,但从命题的内容而言,其理气论与朱子未必不同,而且也不会与其心性论产生矛盾。其原因在于罗整庵虽有“理气为一物”之说,但只是在“理气不杂不离”中强调其“不离”的一面,故其说法虽与朱子“小有未合”,但基本立意并未与朱子对立,如此罗整庵的理气论不致与心性论形成矛盾。林月惠的这篇论文说明罗整庵与朱子的说法虽有不同,但两者的不同不在于思想底蕴与内在逻辑性的不同,而在于论述时所侧重面向的不同,以“人心道心”说为例,朱子重于主观面的心之知觉,而罗整庵则重于客观性理的一面。由此例,再回顾中、韩朱子学者的论辩,则这些意见也表现为朱子学系谱上各种变形样貌的对话与辉映,可视为朱子“理一分殊”的具体化。

本书第五篇为杨祖汉先生的大作《从良知学之发展看朱子思想的型态》。这篇论文的取径十分特殊,是由综观良知学的发展,诸如刘戡山对阳

明之批评，罗近溪、王龙溪之言良知及邹东廓由礼敬论良知等等，反过来检讨牟宗三先生论朱子是“别子为宗”的意见，并提出朱子之思想可属于“由恭敬契入本心”之型态的系统。本文的特色不在于辨正各种良知说的理论曲直，作者认为：“考察阳明之后良知学之发展及演变，可见单从某一端来论良知，是不能尽良知之涵义的。对良知或道德心，人随其性情所近及体悟之不同，而各有偏重的看法，虽各有偏重，并不能说有对错，也不能表示良知之诸义有其客观上之长短高下。故对所谓的‘王学末流’加以渲染，大加批评，不如将其看作为义理思想之渐次发展，合前后学者的不同看法，而见一整体而全面之义理。”

藉由从整体而全面观看良知学的视野，杨祖汉认为阳明后学有分别从仁、义、礼、智四端体会良知学的发展者，而其中亦有重视“敬”的一路，为“以恭敬之心体会良知”之型态。依此而反视朱子，他认为：“邹东廓从戒惧及敬来体悟良知的见解，与朱子十分接近。若是如此，则朱子之所以会与陆王之学不同，所以会有心、理为二等之说，亦可能是由于朱子重敬，由敬契入道德心之故。”换言之，朱、陆（王）之不同，很可能是由契入道德心之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之义理型态。此论文中，将朱子视为以“敬”契入道德心的说法，固然不算新理解，但以仁、义、礼、智、敬区分阳明与其后学，甚而将朱子纳进来的论说，则是新的观察，值得学界重视。

忝列本书第六篇者为拙作《朱子对佛教的理解及其限制》，此文附骥于此的目的在于多样化朱子学的议题。探讨宋儒批评佛教的文章很多，指出朱子（与其他宋儒）不了解佛法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本文在论题及讨论上虽不见突出，但亦尝试梳理《朱子语类》中朱子对佛教的意见，企图藉由朱子在佛教史观、空观及对当时禅学发展的错误认知，说明朱子无法扭转理学家与佛教徒相互交涉、影响的原因。

本书的第七篇为韩国金永植先生的大作《界定并延伸儒学之界限：朱熹论科学与超自然主题》。本文相当有趣地讨论“科学”（天文、历法、医学）与“超自然”（如卜筮、风水、内丹、祭祀等等）之“次要学科”（相对于伦常义理之主要学科）与“儒学”的关联，认为它们不但是朱子“穷理格物”的一环，也是

从仕之儒者所必备的知识。金永植指出：朱子对“自然科学”与“超自然主题”的研究，有其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其做法是先评量当时流行的文本，注疏其早期的著作，最后指出学者应研习的最佳读本。朱子除了文献的整理外，也积极地赋予“超自然”合理性的意义，如将气论带入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且将《易经》视为连结人体与宇宙运转的主要工具，强调占卜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运转等。除了朱子在文献及理论上所做的工夫外，金永植的论文亦提及朱子在面对当时有关于超自然事例时的开放态度，认为朱子很少否定奇事异象的报导。他说：“朱子这种挑战智识的自信表现，不但得以拓展儒学的领域，并且可驯化超自然之信仰与习俗所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不但使后学者相信朱子已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知识系统，也令他们不觉得需要再为修身以外的问题操心。”

本书的第八篇为张崑将先生的大作《朱子的穷理学在德川末期的物理化》。这篇论文所谓的“物理化”是“自然科学化”之义。作者认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儒者对于儒学有三种受容之道：其一是将强调仁政与人间平等观的儒教思想转化为明治时代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其二是否定朱子形而上学，并将圣人之道限定在经世济民所展开的儒学实证主义思想，最后发展为幕末的“开物思想”；其三是透过朱子的“穷理”之学，转而侧重“自然科学”之“理”的态度，如贝原益轩之论说。本文所关注者，即为第三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物理”之学。

张崑将认为，德川时代朱子穷理学进一步物理化的背景在于“兰学”与武士们对“海防”问题的敏感。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比较了当时中、日双方知识分子对海防问题的意见，由此说明“物理化”这一问题，也与近代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息息相关。其次，作者细致地讨论朱子穷理学“物理化”的两条路径：一是从贝原益轩到佐久间象山之强调“物理”重于“事理”，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二是兰学者如高野长英、渡边崋山之扩大“穷理格致”之学的范围。作者最后比较严复与福泽谕吉对中、日两国的启蒙效用，认为福泽谕吉的贡献大于严复，而这种结果实奠基于德川儒者对朱子穷理学的“物理化”。

以上约略介绍本书所收各篇论文的要点,由这些论文所设的议题方向及其论证,亦可知书名所谓的“诠释与发展”并不单指中国一方,而关涉了东亚各国的区域特色与交流互动。如:由“人心道心”说所推衍的论点,可以看到东亚儒者对哲学性的讨论有其基本架构上的同,也有不同契入角度之异,这种同异互现的结果,使得不同时代及区域的朱子学,因此差异的诠释而更加丰富了原有的内涵。又如:由德川时代朱子穷理学的物理化,则更可看到不同地域文化在面对文化冲突时,对原吸纳文化的创新诠释与转化。由此而言,不论是讨论朱子学所涵摄的各种学问系统、哲学理论的特色、个别地域对朱子学的特殊发展以及朱子学在新时代的意义等等不同的议题,皆可展现出朱子学多元与开放的性格,同时也呼应了朱子学“理一分殊”说在形式上的解释格局。

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 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

黄俊杰*

一、引言

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后,工业革命后逐渐形成,而茁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潮流加速发展,蔚为新时代历史之主流。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甚多,如知识本身成为生产资材的“知识经济”,即是一个新的趋势。全球化时代另一项主流趋势就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所说的,全球化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连结性(interconnectedness)。^① 全球各地“相互连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资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2001 年“九一一”事件以及后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所展开的反恐行动,都印证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脉络中,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为了因应在 21 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的

*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兼院长,“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总主持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

①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4-5.